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俄国和冷战 / (美)拉费伯尔著;牛可,翟韬,张静译.—2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12
(大学堂)

书名原文: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e

ISBN 978-7-5100-7294-9

I. ①美… II. ①拉… ②牛… ③翟… ④张… III. ①美俄关系—研究—1945~2006 IV. ①D871.22 ②D8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8346 号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e

ISBN: 978-0-07-353466-4

Copyright © 2010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2010 by The McGraw-Hill Asia Holdings(Singapore)PTE.LTD and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 and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销售。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3482

美国、俄国和冷战(修订第 10 版)

著者:(美)沃尔特·拉费伯尔 译者:牛可 翟韬 张静 丛书名:大学堂 筹划出版: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吴兴元 责任编辑:方理 营销推广:ONEBOOK 装帧制造:墨白空间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人:张跃明

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太福庄东口 邮编 102612)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1256142-8021)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4 插页 3

字数:440 千

版次:2014 年 5 月第 2 版

印次:2014 年 5 月第 4 次印刷

读者服务: reader@hinabook.com 188-1142-1266

投稿服务: onebook@hinabook.com 133-6631-2326

购书服务: buy@hinabook.com 133-6657-3072

网上订购: www.hinabook.com (后浪官网)

ISBN 978-7-5100-7294-9

定价:49.8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中国读者

这部横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1945—2006年)的书的第十版能以中文面世,对此我深感荣幸。牛可教授和他的两位合作者对本书感兴趣,致力于推出中文版,将其学识和严谨性投入到本书的翻译工作中,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在《美国、俄国和冷战》最后几章里,世界上的两大强权已经不再是美国和俄罗斯,而是美国和中国。而且与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不同,1991年以后两个主导性大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里不再是敌人,而是一种在军事上极其谨慎的(有时甚至是合作性的)关系;同时其经济关系惊人的密切,甚至达到相互依赖的程度,虽然一个是资本主义,另一个是共产主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观察家如果知道在70年代以后美中合作关系发展竟然如此之快,将会大为惊异。然而,生活在1945年以前的观察家却会对此毫不奇怪。早在1788年,刚刚独立的美国派出一艘商船前往中国,由此开辟了一宗利润颇为丰厚的贸易,此后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一直有增无减。所以,对于其他殖民列强(尤其是俄国、德国和日本)像它们当时正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所做的那样瓜分中国并使之殖民地化的努力,美国官员自然是特别反感。为了自身利益,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一直遵循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不得为殖民列强所殖民地化,亦不得为其谋取私利的经济政策所损害,而必须保持统一,并对所有国家开放商业关系。美国要求“门户开放”实属必然,因为它正走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在一个统一、开放的中国贸易和投资的竞争中最能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1931年以后与日本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企图迎头相撞,尤其是在中国人因革命而处于分裂状态的情况下。结果是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胜利。《美国、俄国和冷战》解释了紧随其后所发生的事:在朝鲜,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场冲突突然发生,哈里·杜鲁门总统戏剧性地做出接受战争僵局的决定,拒绝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对中国投放原子弹以赢取战争的建议。朝鲜战争引发了美中之间长达22年的冷战,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见,开始修复中美之间的历史纽带。

这 22 年,在长达两个世纪的美中关系中是一个例外。而两百年来的美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平的,而且这种关系对双方在商业上越来越重要。两国不时出人意料地就维护国际稳定所需的重大政策达成协议;特别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遏制俄国的需要使双方达成重大政策协议。这本书讲述了这个故事。我非常感谢牛可教授,他的翻译工作使得中文读者可以读到《美国、俄国和冷战》这本书。

沃尔特·拉费伯尔
康奈尔大学
美国纽约州漪色佳

地图目录

苏联的形成(获准作为联盟成员加入的年份)

冷战高峰期美苏的海外任务

地图 1.1 分裂欧洲中的分裂德国,1946 年 18

地图 2.1 “二战”后的日本、朝鲜、中国和苏联 29

地图 2.2 伊朗、土耳其、希腊和苏联,1946—1948 年 33

地图 5.1 朝鲜战争,1950—1953 年 89

地图 8.1 中东和苏伊士危机,1956 年 149

地图 9.1 中美洲和南美洲,1954—1990 年 169

地图 9.2 南亚,1971 年 177

地图 11.1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的世界地缘政治观 220

地图 11.2 中东,1967 年,1979 年 224

地图 12.1 近东的巨变,1980 年 243

地图 13.1 东欧的转捩点,1989 年 277

地图 13.2 1988—1994 年间爆发不满的地区 287

地图 14.1 历史对今天的影响:巴尔干半岛 302

地图 14.2 里海地区 6 万亿美元石油资源可能的出口路线,2001 年 304

地图 15.1 伊斯兰世界各国政府 318

地图 15.2 中东,2001—2006 年 342

流通。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只有靠着政府大规模干预社会才能生存下来。但是,如果政府主宰经济,它也就可能会管制个人选择,甚至会严重地限制个人的自由。

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警告说:“在长期持续的失业状况下,唯一的问题就是普鲁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哪个会先降临到我们头上。”而按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话,只有美国人意识到“在我们的体制下,我们不能指望不经常与其他国家扩展贸易而得到国内繁荣”,才可能避免这样的情形。一位官员评论说:“资本主义体系本质上是个国际性的体系”,而“如果它不能在国际范围内运转起来的话,它会彻底垮掉”。基于这些原因,美国需要在战后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①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纽芬兰附近海域举行了大西洋会议,罗斯福着手推行他的政策。两位领袖在大西洋宪章的第三条中宣称,战后所有的民族都应该有权利“选择他们将要生活在其下的政府的形式”。第四条为这个原则增加了经济方面的内容: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享有“机会,即在平等的条件下享有世界范围内贸易和获取原材料的机会,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需要这些机会”^②。在之后的四年中,美国人对于这些机会的“需要”惊人地增加了。他们的工业产量增长了90%。而与这种经济实力的发展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其他工业国家被战争损毁,这就保证了美国人会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去争夺世界贸易当中“平等的条件下……的机会”。

过去的大萧条和未来的大萧条的幽灵就这样盘旋在美国人的战后目标之上,气氛殊为不祥。其实,这些目标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也同样是政治方面的。封闭的经济集团不仅仅会损害贸易,也容易发展出政治集团。集团之间的摩擦导致了世界战争。20世纪30年代的事态可以这样简略概括: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先是在经济上彼此对抗,然后就上升到了军事层面上。正如国务院经济顾问威尔·克莱顿(Will Clayton)断言的那样,“在市场上互为敌手的国家不可能在会议桌上长期做朋友。”^③

1944年的时候,美国试图确保战后市场是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国际会议,创设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即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the International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银行将会拥有76亿美元的资金(和两倍资金于此的借贷授权),来担保用于重建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和推动工业化水平较低国家的发展的私人信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73亿美元资金来稳定货币,这样可以使贸易运转顺畅,而不必担

① Henry Wallace, Herbert Hoover, et al., *Preface to Peace* (New York, 1943), p. 413; Lloyd C. Gardner, *Economic Aspects of New Deal Diplomacy* (Madison, Wis., 1964), p. 344; 美国财政部长佛瑞德·文森(Fred Vinson)的证词,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46, p. 8.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后为 *FRUS*], 1941, I (Washington, 1948): 366~368. 这则档案刊载于本书的附属网站 www.mhhe.com/lafeber.

③ 引文见 Lloyd Gardner, *Architects of Illusion* (Chicago, 1970), p. 123.

月,三巨头在俄国黑海疗养胜地雅尔塔会面,共同来塑造战后世界。在波兰的前途问题上,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整个1943到1944年,罗斯福已经表明他懂得俄国人的需要——一个对俄国友好的波兰政府(而不像战时波兰政府那样)。但他对于斯大林在1945年初的举动并没有做好准备。在雅尔塔会议开始之前,苏联人已经承认了一个共产党主导的波兰政府。在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求斯大林允许这个政府中有亲西方的波兰人。三巨头最后达成一致:这个波兰政府必须“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予以重组”。美国海军上将、罗斯福的首席军事顾问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敏锐地看到,这个协定“弹性太大了,以至于俄国人不必要在技术上破坏它就可以把它从雅尔塔一路拉伸到华盛顿”。话虽如此,但是因为当时红军已经占领了波兰,所以这已经是罗斯福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罗斯福的确曾努力要达成弹性小一点的协定,为此倡议发布“被解放欧洲宣言”(Declaration of Liberated Europe)。该宣言规定三大国的每一方都要保证合作,在新近被解放的国家中施用民族自决原则。但俄罗斯人一再修订这个宣言,最后使它实际上毫无意义。罗斯福不得不再次接受残羹冷饭般的既成事实。^①

斯大林离开雅尔塔时,确信他的盟友们至少已经默许了他对于东欧的主宰。这对斯大林来说一定是如释重负,因为战争期间他的政策也被两个方向的力量拉扯。一方面,这位苏联独裁者坚持自己应该有势力范围;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很小心翼翼,并没有向盟友们解释俄国人对这些地盘的控制意味着什么。如果他这样做了,就可能惹恼盟国,使得美国延缓战争物资的运送,并且甚至可能会导致西方和德国单独缔约。(毕竟,斯大林怎么会指望资本主义比自己有更多的忌惮呢?)随着红军如此接近全面胜利,他决不想在最后一刻犯下任何拙劣的外交错误。雅尔塔似乎解除了这种危险。

但是斯大林误算了。雅尔塔会议休会后两周,苏联人开始向罗马尼亚施压,要求罗马尼亚国王任命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政府。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然还记得,在1941年德国人入侵俄国时,罗马尼亚士兵曾经和纳粹并肩作战。此外,丘吉尔已经同意对罗马尼亚弃之不顾,以换取斯大林放过希腊。但是,美国宣称斯大林破坏了“被解放欧洲宣言”。美国人的道理很难驳斥,于是莫洛托夫撕毁了该宣言。^②但是,这并不是美苏双方简简单单的

^① *FRUS: Yalta*, pp. 234 ~ 235, 668 ~ 669, 677 ~ 678, 898. 研究这些事态发展最重要的著作是 Lloyd C. Gardner, *Sphere of Influence: The Great Powers Partition Europe, From Munich to Yalta* (Chicago, 1993). 关于斯大林的乐观看法,参见 Robert Service, *Stalin, a Biography* (Cambridge, Mass., 2005), pp. 465 ~ 468. 关于罗斯福(也包括杜鲁门)对于雅尔塔具有危险性误导作用的公开宣言,尤见 Eric Alterman, *When Presidents Lie* (New York, 2004), 第二章的精彩分析。关于雅尔塔会议上对波兰问题的讨论,以及“被解放欧洲宣言”的文本,见本书资料汇编第1章, www.mhhe.com/lafeber.

^② Daily Staff Summary, March 1, March 19, March 28, 1945, Lot File, NA, RG 59.

一个明显的外交目标。斯大林在雅尔塔许诺要在对德作战结束之后三个月——也就是在8月的某个时候——进攻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据点。在1945年初苏联答应进攻日本,美国官员会觉得如释重负。但到了当年仲夏时节,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就不再想让斯大林的军队距离日本太近了。1945年8月8日,苏联人对日宣战,并且攻进了中国东北。第二天,另一颗原子弹就摧毁了长崎市。如果说投掷第一颗原子弹有其理由的话,那么后来的观察家很少能发现第二次使用原子弹有什么道理。勉强说得上是道理的无非一是杜鲁门并没有阻止投掷(后来他的确下令没有他的特别指令不允许再投掷),再就是在美国最高官员看来,由于苏联对中国东北的进攻,日本必须马上向美国人投降才行。

1945年8月10日,天皇制服了军队,日本开始了和平谈判。在美国空军另外多次猛烈的常规空袭夺走数千名东京市民的生命之后,东京和华盛顿在8月14至15日签订了若干投降条款。如果按照史汀生力主的做法,杜鲁门早一些宣布可以保留日本天皇(但要去除其神圣地位),这些条款本可以早些达成。但是,贝尔纳斯警告说如果杜鲁门做出这样的妥协,美国人民会咒骂他。最终总统还是接受了保留天皇的做法。既然美国人已经做出这种表态,加上苏联在8月8日的对日宣战,天皇和他的顾问们就确信还是趁早媾和为妙,因为他们所恐惧的情况莫过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其宿敌俄国就会用军队把共产主义体制强加于日本列岛。苏联军队从未能踏足于日本各主岛之上。所以当杜鲁门拒不与俄国分享对日占领的任何实质性权力时,斯大林也只能激烈而徒劳地抗议了。

杜鲁门放言称:原子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物”。他并没有为使用原子弹而感到内疚。这位总统向记者解释的时候提到“对珍珠港理无可恕的攻击”,他说:“当你和野兽打交道的时候,你必须把它当作野兽来对待。”(但是,在他临终之时的1972年,杜鲁门看起来在解释为什么下令投掷原子弹这个问题上很烦扰。这是个挥之不去的幽灵。)^①8月19日,李海海军上将在向全国的广播中宣布,美国拥有实力超过任何其他两国现有舰队总和的海军、世界上装备最好的地面部队、“最大的和最有效率的空军”,以及“英国盟友,此外还掌握了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的秘密”。很明显,美国人在“二战”结束时手里握着最好的一把牌。当月,国务卿贝尔纳斯公开宣布了在这轮牌局中美国的筹码。

他开宗明义地说道:“我们的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对外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美国的就业,而美国的繁荣和萧条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贝尔纳斯表述了他的一个“确凿无疑的信念,即持久的世界和平不能

^① 引言见 Lisle A. Rose, *Dubious Victo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Kent State, 1973), p. 363; 杜鲁门在 1972 年的情况见 Ralph E. Weber, *Talking with Harry* (Wilmington, Del., 2001), p. 4. 杜鲁门在 1945 年 10 月 27 日的演讲反映了他当时的观点,见本书资料汇编第 1 章, www.mh-he.com/lafeber.

词的“关键点”在于这样的一个建议：英美在联合国之外，以原子武器为后盾（这篇演说的题目是“和平的肌腱”），“在欧洲建立一个不会永久性地排斥任何一个国家的统一体”。苏联人认为这是对他们东欧权力的直接挑衅。一周之内，斯大林就攻击丘吉尔和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宣称他们与希特勒类似，持一种“激进理论”，即讲英语的民族“应该统治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国家”。斯大林警告说，这是在“策划一场战争，是在号召发动一场对苏联的战争”。^①

在丘吉尔演讲之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开始实行一系列新的政策。今天看来，这些政策标志着1946年春夏是冷战的里程碑。先前的15个月里，苏联人在尽力争取一笔贷款；可就在这几周里，他们终于断定华盛顿没有兴趣贷给他们10亿或者任何数量的金额。他们拒绝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原先希望用美元诱使苏联从东欧撤退并加入资本主义控制的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来它的打算就落空了。

实际上美国这种希望原本就是没道理的。对俄国来说，控制边界的安全地带要比得到10亿美元甚至100亿美元重要得多。此外，早在1944年9月，一份美国的情报报告就间接地警告不要使用经济压力。这份报告指出，因为可以有巨大的国内牺牲，所以俄国“有能力只用其国内资源进行重建，而不用外国的贷款或赔偿”。1946年4月，国务院同意了这种结论，当时贝尔纳斯告诉内阁“只有在一个地方，金钱也无法改变国家利益，这便是俄国”。（这位国务卿又说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话：“我们在全世界都会遇到这类事情，而这一点没有几个人能认识到。”）^②华盛顿曾经希望，原子弹可能使苏联人更“好控制”些，这个模糊期待没有起作用；如今，金钱收买苏联人的尝试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在国内，斯大林宣布了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之后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运动，旨在消除西方的影响，神化和宣传斯大林的教条，并对斯大林本人搞个人崇拜。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③的名字很快和这场运动联系在一起了。一位熟悉此公的观察者如此形容这个政治局里所谓的“知识分子”：“五短身材，修剪齐整的褐色短髭，高高的额头，尖尖的鼻子，一张有些病容的红脸，”他在“每个方面都略有所知”，但是对哪一门也谈不上精通，“这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拾取关于其他领域的学问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① Interview in *Pravda*, reprin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1946.

② “Memorandum for Baruch from Sam Lubell,” March 1945, Papers of Bernard Baruch,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Princeton, N. J.; “Cabinet Meeting, April 19, 1946.” Notes on Cabinet Meetings, 1945—1946, White House File, Truman Library.

③ 安德烈·日丹诺夫（1896—1948），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亲密的政治伙伴，原苏共中央书记，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对苏联的文学界、艺术界以及整个知识界加以严格控制，并在1947年主持了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的建立。——译者注

特殊地位,而其他国家则要接受国际机构的检查。一个月之后,杜鲁门任命华尔街的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为美国派驻新成立的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首任代表。美国的政策开始迅速转变。巴鲁克生性多疑,他不相信艾奇逊—利连萨尔报告,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在该报告的起草委员会里居有一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个报告并没有涉及俄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巴鲁克决心排除苏联人在核查和制裁方面的否决权。而艾奇逊—利连萨尔报告则是打算在俄国同意的基础之上通过总体原则,然后再讨论关于否决权的问题。巴鲁克对副国务卿艾奇逊(他错误地指控艾奇逊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录了音)越来越反感,也对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之类的“世界大同论者”(One Worlder)越来越讨厌,称“我不再能理解”这些人了。^①所有的“世界大同论者”都批评巴鲁克认为可以强迫苏联人放弃他们的否决权。但是巴鲁克最终还是胜利了,因为他说服了杜鲁门对苏联人强硬起来,而且要宜早不宜迟。在回顾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军裁减装备的事情之后,这位总统同意了巴鲁克的观点,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扔掉手中的枪,除非我们能断定其他国家不会武装起来反对我们。”^②军事和政治顾问也都支持这种观点,断言俄国人至少在5到15年的时间里不会研制出原子弹。只有少数科学家警告说这个时间段要短得多。

1946年6月,巴鲁克在联合国发表了一通惊人的演说,提出这样一个计划:通过对制造核武器所需的原材料进行国际管理,以及通过国际机构的检查,来控制原子能。不允许对这些控制和检查措施行使否决权,大多数成员同意即可实施。在和平应用核能方面,设立同样不在否决权影响范围内的“原子能发展管理局”(At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该机构将会根据战略和地理的标准建立原子工厂,而不是根据需要(比如在欠发达地区或俄国的广大幅员内)。通过控制这个机构中的大多数成员,美国就可以控制苏联人在其境内对核能工业用途的开发。(巴鲁克的演讲见本书的资料汇编第2章, www.mhhe.com/lafeber.)

这个计划自然对俄国人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先摧毁所有原子弹,停止核武器的生产,所有大国都同意不使用核武器,然后再来讨论控制的问题。巴鲁克则回应说,俄国人必须接受美国的全盘计划,否则没有别的计划好谈。结果就真的没有别的计划了。取而代之的是,国会根据1946年的原子能法案建立了一个“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由于军方的强大压力,这个法案禁止在核能应用方面与任何国家交换信息,除非参众两院联合作出决议,判定已有“有效的”国际控制措施得以实施。而显而易见的

^① Acheson file, Atomic Energy, Baruch Papers, especially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Baruch and Acheson, November 26, 1946.

^② “BMB[Bernard M. Baruch] Memorandum of Meeting on June 7, 1946, with the President and J. E. Byrnes,” Truman File, Atomic Energy, Baruch Papers.

是,要实施“有效的”国际控制,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这样,在日本投降之后一年的时间里,核武器的潘多拉之盒一直敞开着,贝尔纳斯的演讲表明德国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死结,而美俄贷款的谈判也失败了。斯大林和丘吉尔都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但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杜鲁门还什么都没有说。他和其他美国人甚至对丘吉尔建立英美伙伴关系的建议反应冷淡,因为这会把美国束缚在一个衰落的、几乎快要破产的英国身上。这位总统公开表示不会采取丘吉尔的建议。在整个1946年,即使在伊朗和土耳其危机当中,杜鲁门都从未公开地谴责过苏联的政策。

但是没有人怀疑杜鲁门的决定将会塑造西方世界。在坐火车去往密苏里富尔顿的路上,丘吉尔背诵起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①的一首诗的很长一部分,这让款待他的美国主人很高兴。与此同时杜鲁门正在走向火车头。在这位英国佬引用美国作家的诗的时候,美国总统却在充当火车司机的角色。两人的做法都恰如其分。在1945—1946年这两年内,杜鲁门都在和苏联对峙,但是,他还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方针,也还没有凝聚起国内共识来支持这样一个如此广泛而重大的政策。问题是杜鲁门会以多快的速度把西方国家的列车带到哪个方向。

四、犹疑未决中的美国

奇怪的是,到秋天苏联人变得安静下来时,杜鲁门的任务反而变得困难多了。杜鲁门的麻烦不再是像在伊朗和土耳其那样围绕着迫在眉睫的苏联扩张威胁。随着西欧进入现存记忆中最为严酷的一个冬天,杜鲁门立即面临一个极为繁重复杂的任务,即重建被战争严重破坏的西欧。英国笼罩在凄风苦雨当中,左翼中的一支激进力量有可能上台。中欧的部分地区面临饥荒。法国混乱不堪。杜鲁门害怕法国共产党从内部夺权,所以曾经秘密命令驻德美军准备好开进法国。^②西方并没有受到红军威胁,而是面临内部崩溃。杜鲁门最亲信的顾问催促他用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去建设属于我们的世界”,以免苏联因美国无所作为而获胜。^③

但在总统看来,这个建议简直是痴人说梦。国会和美国人民对苏联的攻击做出反应是一回事,但要在欧洲花费纳税人几十亿美元就是另一回事了。美国人辛酸地回忆起欧

① 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ittier,1807—1892),美国诗人,废奴运动的倡导者。——译者注

② *FRUS, 1946, Europe, V: 435~438.*

③ 这种政策路线一个很好的简短分析是 Richard M. Freeland, *The Truman Doctrine and McCarthyism* (New York, 1972), pp. 56~57.

洲人是如何忘恩负义地对待自己“一战”时给予他们的帮助的。支援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做法将不受欢迎,因为他们的贸易措施和帝国主义政策长久以来一直让美国人很恼火。此外,美国人在战争当中也有牺牲,现在他们还想着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呢。这件事很不容易,因为1946年底的通货膨胀剧增、罢工和肉类短缺不仅给美国经济,也给杜鲁门的声望造成了伤害。很多美国人认为,如果总统想要帮助谁的话,那他应该先减税来帮助自己人。到1946年秋天,杜鲁门的难处已显露无遗,自由派攻击他太过军国主义,而保守阵营则诟病他的经济政策。

攻击杜鲁门的自由派人士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他是新政早期声名赫赫的农业部长,1941—1945年任副总统;1944年他在操弄下被挤出副总统提名人,这样杜鲁门才当上罗斯福的竞选搭档,最后华莱士在1945年担任商业部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他所谓的“普通人”造福的事业当中去,给小商人增加贷款,尤其是通过扩大对外贸易把经济蛋糕做大。华莱士很快发现,杜鲁门对苏联人的好战态度危及与俄罗斯、东欧甚至中国的贸易渠道。

1946年9月12日在纽约的一个政治集会上,华莱士发表了一个演讲,引得杜鲁门赶忙亲自出来做出澄清。这篇演讲的要点是,一定要与俄国在政治上达成谅解。华莱士宣称,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苏联在东欧的安全。他希望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在“友好的基础上”竞争,并且“使相似之处不断增多”。但是,华莱士在演讲的愉快结尾处又补上了附带的一笔:“我们必须坚持在全世界范围内开放贸易的门户……我们不能允许东欧的贸易大门被关闭起来,正如我们要求中国市场也要对外敞开一样。”^①此刻贝尔纳斯和范登堡正在巴黎与莫洛托夫进行艰苦而毫无成效的和平条约谈判。他们立即要求华莱士去职,9月20日杜鲁门照做了。^②

两人对华莱士演讲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从中能够看出美国的政策自“二战”以来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华莱士本质上在呼吁美国政府回复其在1945年向苏联发出的邀请,即邀请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苏联经济来加入一个友好的经济竞赛,当然是按照美国的游戏规则与美国工业的庞然大物来竞争。到1946年年中,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已经离此很远了。他们当时确信,斯大林不会接受美国的规则;但是如果他面临优势武力的直接威胁,他也会与美国人合作的。考虑到这个背景,再加上华莱士关于世界范围内门户开放的高调呼声,无怪乎纽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首先对华莱士的演讲发起

① Henry Wallace, “The Way to Peace,” *Vital Speeches*, October 1, 1946, pp. 738 ~ 741.

② 见 John C. Culver and John Hyde, *American Dream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A. Wallace* (New York, 2000), 关于背景见第 5 ~ 14, 20 ~ 21 章; 关于去职见第 411 ~ 431 页。华莱士的演讲见本书的资料汇编第 2 章, www. mhhe. com / lafeber.

攻击,称之为“美帝国主义”的伪装。只有当贝尔纳斯和杜鲁门严厉批评华莱士时,《工人日报》才悟到他的主张的价值。

尽管如此,华莱士还是表达了许多新政派人士的关切。9月底,一个劳工领袖团体与罗斯福新政的两位坚定支持者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和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会面,宣布支持华莱士的观点,并发出停止核试验的呼吁。而杜鲁门却坚信华莱士是个“和平主义者”,比“二战”期间美国亲纳粹的团体还危险,属于“听命于乔·斯大林大叔的破坏阵线”。^①

新政联盟的分裂严重损害了杜鲁门的政治资本,但更糟的还在后面。总统变得非常不受欢迎,民意调查中仅有32%的受访者认为他胜任总统职务。杜鲁门的民主党同仁居然不请这位总统为1946年的国会竞选活动助威,反而更愿意在广播中播放罗斯福演讲的录音。这次选举对于杜鲁门政府来说是个灾难,共和党人自1928年以来首次牢固地控制了参众两院。此外,共和党的这个“1946年级”包括了雄赳赳气昂昂的保守派,如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雷克尔(John Bricker),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这些新科国会议员在选举中一直高举反共大旗,但也呼吁大幅度减税。他们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支持对欧洲的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特别是在斯大林仍然保持安静的情况下。^②几位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如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建议说,如果杜鲁门能辞去总统职务,那将是他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在1946年的最后几天,反击开始了。一个自由派团体准备在华盛顿集会,以成立“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③。与华莱士不同,这个组织保证继续在民主党内部活动,并主张在国内和海外两条战线上抗击共产主义。成立大会的主席是神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他也许是对当代美国思想影响最为重大的人物。自18世纪40年代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④以来,没有一位神学家如尼布尔那样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和爱德华兹一样,尼布尔也强调在这个社会中原罪和罪恶的权力的重要性。他极不赞成在1900—1930年这段时期中塑造了美国思想的那种“情感乐观主义”,这种思潮在1945年之后的世界里以“积极思考”的面目再次出现。

① Margaret Truman,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1973), pp. 346 ~ 347.

② Susan M. Hartmann, *Truman and the 80th Congress* (New York, 1971), p. 49.

③ 简称 ADA,是民主党自由派政治组织,于1947年成立。创始人有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译者注

④ 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美国神学家和思想家,被认为对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觉醒”产生了重要影响。——译者注

一个胡桃的两半 (1947—1948 年)



杜鲁门总统发布了他的“杜鲁门主义”，以至于美国人没得选择只能咽下打冷战这剂苦药——在 1947 年和接下来的 40 年。

上图：杜鲁门（右）手中瓶子上写着：“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工人模样的人（左）：“这闻起来有点苦！”地下小牌子：“美国人民”。

下图：杜鲁门：“那就试试这个！”手中瓶子上写道：“俄国的侵略”；工人模样的人：“这更糟！”

(Fred O. Seibel Cartoonist's Research Collection, MSS 2531,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Library)

一、杜鲁门主义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最终发布了他自己的冷战宣言,附带着还提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他戏剧性地向国会提出杜鲁门主义,要求美国人加入全球性的反共事业。美国全国对他做出回应。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后,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声称:“作为‘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没有什么比杜鲁门主义中的反共产主义更重要。”^①

尽管如此,要理解杜鲁门主义,就必须先解释一下当时那种奇怪的形势。在杜鲁门发表宣言之前的几个月,苏联的攻击性要比战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缓和。国务院的官员私下里认为“苏联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使得“苏联当局在最近数周的时间里采取了缓和的国际姿态”。当然这政策“只是一个暂时的退却”而已。但是无论如何苏联的麻烦看起来的确很大,以至于苏联人让“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复员,以充实工业、农业和建设行业的劳动力”。^② 斯大林把1945年的1200万军队裁减到了1947年的300万到400万。(美国的军队从1000万减到了140万,但美国人垄断着原子弹。)俄国的军备水平不会再往下走了,因为红军是斯大林对付杜鲁门原子弹的筹码。俄国军队在东欧站稳脚跟,一旦俄国受到原子弹攻击,就拿整个欧洲大陆做人质。斯大林缺乏能够实施远程进攻性打击的海军力量。他的舰队主要依靠着300艘用于防守目的的潜艇。^③

所以说,杜鲁门迫在眉睫的麻烦并不是苏联入侵的威胁。正如迪安·艾奇逊私下议论的,俄罗斯人不会向美国发动战争,“除非他们完全疯了”。斯大林曾指示各地的共产党人要等待时机,西方的“总危机”正变得日益“尖锐”,这会把美国“原子弹—美元”外交政策冲垮。美国担心斯大林的盘算是对的,杜鲁门更大的麻烦正在这里。共产党的力量在欧洲迅速扩大。尤其是在法国,新生的第四共和国的首届内阁中有4名共产党人,包括国防部长。前殖民地动荡局势也为革命者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号称英国皇冠上的两颗宝石的印度和埃及正在闹独立,严重地冲击着英帝国。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和尼泊尔很快也加入到独立运动的行列中来了。法国则开始了八年漫长而又徒劳的夺回印度支那的战争。荷兰在印度尼西亚面临着全面的革命。中东局势也动荡不已,因为几个国家决心要完全独立,并且还有10万名想要在巴勒斯坦建国的犹太人已经涌入该地区。

^① 关于背景和引言,见 J. William Fulbright, *The Crippled Giant* (New York, 1972), pp. 6~24。

^② Daily Staff Summary, January 3, January 15, February 10, 1947, Lot File, NA, RG 59。

^③ Thomas Wolfe, *Soviet Power and Europe, 1945—1970* (Baltimore, 1970), pp. 10~11, 33, 45~46。

1946年末到1947年初,美国的官员越来越注意到这些新兴地区了。如果英国、法国和荷兰不能解决其殖民地问题,欧洲不可能完全稳定下来。经济学家、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顾问、国务院官员阿道夫·伯尔(Adolf Berle)在1946年底宣称,苏联和美国已经在低度工业化国家展开一场争取追随者的战役。伯尔解释说:“四年之内,世界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显著的生产过剩问题。”如果美国的剩余产品被用于引导新兴国家的物质重建,就可以消除“使战前美国经济深受其害的‘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周期”。^①

“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已然浮现出来。在1946年初,美国经济呈现疲软态势,失业率上升,尽管此后经济增长有所恢复。国务院的专家担心这种改善只是暂时的,因为它依靠的是150亿美元的出口贸易,而这几乎达到20世纪30年代水平的四倍。这些出口中的大部分用于重建西欧,但是欧洲人很快就花光了支付进口商品的美元。当花完剩下的美元和黄金,欧洲就会沦入萧条,之后可能是抓住社会主义这根稻草以求自救。如果这样的话,美国人将失去最重要的市场,而且很有可能回到30年代的局势及其所有可怕的政治后果上去。杜鲁门在1947年初明白了这种局面,但是主张减税的共和党国会和他本人走低的民意支持率似乎使其难有作为。

转机出现在1947年2月21日。那天,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驱车前往国务院大楼。他通知艾奇逊说,由于本国的经济危机(超过一半的工厂停工),英国无力支付土耳其和希腊所需的2.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后来指出:“与英国从中东退出一样,这件事对其继任者也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②

美国的官员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从1944年一直到1947年,他们密切关注着希腊的事态发展,看到英国人为重新控制希腊而深深陷入希腊内战的泥潭。希腊内战中,一方是伦敦支持的保守的君主政体派;另一方是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NLF),由共产党领导,因领导希腊民众抵抗纳粹而获得民众支持,拥有很强的实力。到1947年,民族解放阵线接受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布罗兹(Broz Josip,即铁托元帅)的支持。这个南斯拉夫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希腊共产党同志的情意,而是想把希腊的一部分并入他的大南斯拉夫联邦。斯大林并没有直接卷入希腊的事态,而且他实际上越来越厌恶铁托过度膨胀的野心。

但是,随着民族解放阵线力量的增长,美国却实实在在地卷入了希腊的事态。整个1946年,美国向希腊派遣特别代表团,在那儿砸下了2.6亿美元的援助款,并且站在英国一边。正是由于美国在希腊的这段经历,所以国务院可以在艾奇逊接到英国人口信一周之内就制订出详细的援助建议。仅仅19天之后,杜鲁门就可以在国会面前提出一个完整

① R. Dennett, ed.,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III (Princeton, 1951): 607~608.

② James Forrestal, *The Forrestal Diaries*, Walter Millis, ed. (New York, 1951), p. 245.